

楚辭新注

聂石樵注

屈子行吟圖



楚 辞 新 注

聂 石 樵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字数 136,000

1980 年 8 月第 1 版 198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0

统一书号: 10186·218 定价: (六)0.62 元

前 言

“楚辞”是继《诗经》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诗歌体裁。它的出现为我国古典诗歌开拓了新的领域，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后人往往“风”“骚”并称，把《诗经》和《楚辞》作为自己创作的榜样，作为吸取创作经验的丰富源泉。

“楚辞”被编辑成集，是比较晚的。但是作为一种在南方流行的民歌，则是很早就产生了，只是没有象北方的民歌那样被人们较早地搜集整理成书而已。据《吕氏春秋·音初》篇记载，涂山氏之女等候禹于涂山之阳，作歌曰：“候人兮猗！”这便是南音的起源。到了周代，《诗经》中的《周南》、《召南》都是江汉流域的歌曲。《周南》之《汉广》、《螽斯》，《召南》之《摽有梅》，句尾或用“思”字，或用“兮”字，和“楚辞”的句式很接近。春秋战国之际，这种歌曲逐渐发达，越地的“今夕”歌（见《说苑·善说》），徐地的“带剑”咏（见《新序·节士》），吴地的“庚癸”谣（见《左传·哀公十三年》），楚地的“沧浪”曲（见《孟子·离娄》）和“接舆”讴（见《论语·微子》）等，句法都参差错落，托体兮猗，“楚辞”的形式已臻于成熟。最能体现由南方的民歌演变为“楚辞”的是《九歌》。《九歌》本来是古代楚国广泛流传的民间祭歌，经过屈原的修润、加工，正式形成为“楚辞”。可见，“楚辞”是在这些楚国民歌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把楚人的诗歌称为“楚辞”，最早见于西汉初年的记载。朱

买臣以善言“楚词”为汉武帝所宠幸（见《汉书·朱买臣传》），九江被公以能诵读“楚辞”为汉宣帝所欣赏（见《汉书·王褒传》）。到汉成帝时，刘向典校经书，把屈原、宋玉、东方朔、庄忌、淮南小山、王褒以及他自己的作品，编辑在一起，称为《楚辞》。这是最早出现的《楚辞》专集。什么叫“楚辞”呢？最合理的是宋人黄伯思在其《翼骚序》中的说法：“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引）他道出了“楚辞”的实质和地方特色。

屈原是“楚辞”的奠基人，是“楚辞”的最高成就者。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他出身于楚国的贵族，“博闻彊志”，“娴于辞令”，怀王时曾做左徒的官，很受信任。怀王让他“造为宪令”，草稿未成，上官大夫靳尚要夺去看，他不给，上官大夫便向怀王进谗言，怀王因此大怒，把他放逐到汉北。后来顷襄王即位，以子兰为令尹。屈原痛恨子兰劝怀王入秦而致死，子兰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进谗言，顷襄王又把他放逐到江南去了。屈原在江南到处漂泊，忧心愁悴，最后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约生于公元前三三九年（楚威王元年），卒于公元前二七八年（顷襄王二一年），共经历了威王、怀王、顷襄王三个王朝。他的主要政治活动和创作活动，是在怀王和顷襄王时期。这个时期就战国的形势讲，是从奴隶主所有制转变到地主所有制、从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的大转变时期。就楚国的形势讲，是楚国贵族政权由盛转衰的时期。屈原就生活在这一历史的转变关头，生活在这新旧交替的时代。屈原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记载，共二十五篇。这二十五篇比较完整的保存到现在。其中有些篇目的真伪问题，虽

然学术界还有争论，但《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以及《离骚》、《天问》、《招魂》等篇一般公认为屈原所作。这些作品真实深刻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反映了楚国当时的社会现实。

屈原是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向守旧的腐朽的贵族统治集团进行斗争的。他一生为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斗争，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献身。他的全部作品，就是他一生斗争生活的实录。

屈原在《离骚》的结尾说：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他的所谓“美政”，即他的政治理想。为了理想不能实现，竟至于自杀，可见他对自己的政治理想多么坚贞、执着！他的“美政”理想是什么呢？具体说，应包括以民为本、举贤授能和修明法度三个基本内容。他在《离骚》中说：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这种民本思想是春秋以来的一种时代思潮，如《左传·僖公五年》记载宫之奇一段话说：“鬼神非人实亲，唯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唯馨。’又曰：‘民不易物，唯德繁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其中虽然杂有一些神权观念，但是，很明显地包涵一种“德政”思想和对“民”的地位的重视。到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思想更盛行起来，在诸子的著作中记载得很多。屈原的思想正是这种进步的时代思潮的反映。基于这种思想，屈原特别关心人民、同情人民，尤其是当他看到人民灾难深重的时候，这种思想就表现得更深沉诚挚：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离骚》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

——《离骚》

皇天之不纯命令，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

——《哀郢》

他为人民的苦难而叹息流涕，愤怒地揭露了人民苦难的根源，揭露了昏庸腐败的贵族统治集团是人民苦难生活的制造者。

“举贤授能”，是屈原政治理想的重要方面。他在《离骚》中说：

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这种主张，虽然是借古代的圣君贤王作榜样，实际上是针对当时楚国那些胡作非为的奸佞之臣而发，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在《离骚》中进一步说：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甯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

傅说是个罪犯，吕望是个屠夫，宁戚是个商贩，而屠夫、商贩在周朝的地位和奴隶相等，罪犯更不用说了，他们都是社会的最低层。社会最低层的人，只要有才能，就可以提拔重用。屈原这种思想是相当大胆和可贵的。

修明法度是屈原政治理想的另一个方面。他在《离骚》中说：

固时俗之工巧兮，偃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即是对当时楚国贵族统治集团违法乱纪现象的谴责。《韩非子·有度》篇说：“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正见法度的重要。屈原在《九章·惜往日》中则说：

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乘汎汎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

把不以法度治理国家，比作骑马不施辔衔，行船不用楫篙，终归要失败。这与韩非的思想如出一辙。

屈原的政治理想，与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可以说他是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去关心和同情人民的。当然，作为文学家的屈原，和作为地主阶级思想家的荀况、韩非不同。长期的流放生活，使他更接近人民，更联系着人民，特别是郢都破灭的时候，他与人民共同过着流亡生活，就更了解人民，因而使他的作品具有更丰富、更深刻的人民性。

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屈原和楚国贵族统治集团进行了顽强激烈的斗争，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腐朽，特别是批判了楚王的昏庸、贪婪和残暴。怀王早年还有点想改革政治、富国强兵的念头，但是后来受群小的包围，自己反复无常，连这点革新的念头都消失了，完全变成一个昏君。屈原在《离骚》中从“伤灵修之数化”到“怨灵修之浩荡”，反映了对怀王越来越深的怨恨，最后直接指斥说：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齎怒。

在《惜往日》中他更反复指斥楚王说：

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弗省察而按实兮，听谗人之虚辞。

对怀王的政治面貌，秦惠文王的《诅楚文》中有比较深刻的揭露：“今楚王熊相（怀王），康回无道，淫佚甚乱，宣侈竞纵，变输盟刺。”这篇文章应作于楚怀王十七年，正是秦、楚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否因为交战国而有点言过其实呢？《庄子·则阳》篇说：“夫楚王之为人也，形尊而严，其于罪也，无赦如虎。”可以证明《诅楚文》所揭露的完全是事实。屈原的作品便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情况。他笔下的夏启、太康、后羿、浇、夏桀、后辛等，既然是用来劝戒楚王的人物，那末也可以说明楚王的所作所为之中有他们的影子在，描写他们，也有对楚王批判的因素在。所以班固批评他“责数怀王”，颜之推则指斥他“显暴君过”。这恰好从反面道出了屈原作品的斗争精神和进步意义。

围绕在楚王周围的宗室贵族、元老重臣、左右便嬖等，则互相勾结，朋比为奸，排斥正士，压榨人民，造成当时社会的极端黑暗。屈原对这一贵族集团的腐朽本质也给予了深刻的揭露：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离骚》

椒专佞以慢慝兮，桀又充夫佩帙。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离骚》

贵族统治集团擅权误国，楚国的政治被他们导向是非混淆、香臭莫辨、黑白颠倒、上下易位的地步。屈原往往用“溷浊”二字来概括当时的政治，如“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

称恶”(《离骚》);“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涉江》);“信谗谀之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惜往日》)等等,这种情况和历史上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据《战国策·楚策》记载:“苏子谓楚王曰:‘今王之大臣父兄,好伤贤以为资,厚赋敛诸百姓,使王见疾于民。’”又《战国策·中山策》记载秦将白起分析楚国的情况说:“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屈原的作品便是楚国这种腐朽政治的真实具体的反映。

屈原对自己政治理想的坚持,对楚国贵族集团的批判,目的是希图楚国富强,是出于对楚国的热爱。他参与了火热的政治斗争,不以穷独而灰心,不在强大的恶势力面前变节,与当时朝秦暮楚的游说之士,以及象《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的“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等人的表现卓然不同,他誓死不离开楚国,与楚国腐朽的政治集团作不倦的斗争。他在《橘颂》中说: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以橘为喻,表明自己坚贞不贰的立场。屈原在政治上遭受挫折时,也曾经想过离开楚国,《离骚》中那段很长的关于神游的描写,应该就是他这种心理状态的反映。但是,一个热爱祖国关心人民的人是不会轻易抛弃故土的,经过一番神游,他最后还是回到自己国土上来了: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
蜷局顾而不行。

——《离骚》

屈原这种爱国思想,当国破家亡的时候,表现得更为深沉诚挚:

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

——《哀郢》

《庄子·则阳》篇记叙庄周对自己国家楚的看法：“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使丘陵草木之缊，入之者十九，犹之畅然，况见见闻闻者也？”经过战乱，楚国的都城十之八九都埋没于丘陵草木之中，庄周还畅然喜爱。屈原所谓“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即庄周所谓“丘陵草木之缊，入之者十九”的意思，他比庄周表现了更深的思想感情。他为国家的破亡而悲痛思念，以至于连觉也睡不着：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唯郢都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

——《抽思》

他急切地希望重返旧都，誓死也要回去：

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哀郢》

正如司马迁所说：“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屈原总是把自己的国家和国君联系起来，把爱国和忠君联系起来。这是他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是不必苛求于他的。

屈原在艺术上有独特的创造。他把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通过完美、精练和光彩夺目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和以前的《诗经》相比，他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

最突出的是他作品中所表现的浪漫主义精神。这在《诗经》中显示得不充分、不明显，而在屈原作品中却表现得极其鲜明。屈原作品中的浪漫主义精神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想象的奇幻优美以及对理想的追求和坚持。他运用丰富的形象思维，把所描写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都形象化了，而自己就在那个幻想的境界之中，不倦地追求、探索着。象他向重华陈辞之后，便乘龙御风而飞升，历与古神话中的神灵接触，但每次接触都使自己失望：要进入天帝的九重宫，可是帝阍却不给他开门；要到人间寻求高丘神女，神女恰巧不在那里；去宓妃那里求爱，宓妃却对他无礼；又找到了简狄和二姚的居处，可是没有媒人说合。总之，所逢不偶，终归失败。这一段通过幻想所创造出来的雄伟壮丽的境界，反映了屈原在现实中对理想政治的探索 and 追求。《战国策·楚策》记载楚国当时的情况是“谒者难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天帝”。《离骚》则说：

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正是这种现实情况的真实形象地反映。屈原驰骋着奔放奇幻的想象，广泛采用了神话神巫的故事，对这些故事中的人物极尽美化之能事，用香花蕙草点缀他们的衣冠服饰和帷幕旌旗等，把他们描写成美的象征。如《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

美好的容貌、性格、感情，写得若即若离，似有似无，真是传神之笔。又如少司命的荷衣蕙带，湘君的荪桡兰旌，云中君的华彩衣，湘夫人的薜荔帷等，都是用香花蕙草的美，来衬托他们品质、性格的美。作者通过这些神话神巫的描写寄托自

已对美的理想。此外，作者还在《天问》中对那些离奇的神话传闻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从宇宙起源、日月星辰，直到神话传说、历史旧闻，提出一连串的疑问，反映出他对天命鬼神等传统思想的大胆怀疑精神。因此说，对美的理想的坚持，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自然、历史奥秘的怀疑与探索，是屈原作品浪漫主义精神的核心。

在屈原的作品中，大量而成功地应用了比兴手法。这种手法在《诗经》中已经比较多地运用了，屈原对此又作了很大的发展。比，是以彼物比此物；兴，是用彼物引起所咏之物。二者在某些情况下又很难区分。要之，都同样是一种表情达意的形象思维方法，是用形象思维来表现生活的本质。王逸在《离骚序》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王逸的话虽然不完全准确，但是他明确指出屈原的作品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却是真知卓识。如《离骚》中用鲜花、香草比喻人的品质、志行的高尚和纯洁：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

——《离骚》

又用臭物或萧艾比喻变节者或小人：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离骚》

通过对比，对良莠、美恶、贤愚等，就有了更鲜明更具体的认识，从而引起人们强烈的爱和憎。作者还用鸷鸟和鸱鸢比

喻忠贞之士和奸佞之辈，都具有同样的艺术效果。更令人注目的是作者用鲜花香草自喻：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緼緼。……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离骚》

把江离、辟芷、秋兰、木根结茝、菌桂纫蕙以及荷衣芙蓉等，都用来象征诗人自己品格的高尚和坚贞，这就把诗人的形象升华、提高了。

屈原还用道路来比喻人们遵循的政治方向、品德行为等。在《离骚》中，他把古人的美德懿行说成是“遵道而得路”，把奸佞之辈排斥忠良的行为斥责为“路幽昧以险隘”。认为楚王的改弦易张是“悔遁而有他”，认为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是“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要“奔走先后”及“前王之踵武”等等。由于作者广泛地运用比兴手法，因此把政治性很强的内容，包蕴于丰富、鲜明和个性突出的形象之中，产生言简而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司马迁赞扬《离骚》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迳而见义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这是对屈原作品比兴手法的卓异成就之高度概括。

另外，屈原在文学语言的运用上，比《诗经》也有很大的进步与发展。《诗经》的形式基本上是四言体，而屈原的作品则在吸收民间歌曲的基础上形成一种长短不齐的《骚》体。这种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变化的新的诗歌形式，在我国文学史上是首创。屈原采用了许多楚地方言，宋人黄伯思所谓“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他在《翼骚序》中还举“些、只、羌、淬、

蹇、纷、侘傺”作楚语的例子，举“顿挫悲壮，或韵或否”作楚声的例子，这都是正确的有见地的。除此以外，屈原作品中的汨、搯、冯、邴、班、莽、詠、軼、灵、等、闾阖等，也都是楚地的方言。屈原采用的楚地方言，并不是自然形态的语言，而是经过了提炼和加工，使之更能传神状貌，增强了诗歌的语气和形象性。在“兮”字的运用上，就灵活多样。有的用在句尾，有的用在句中，有的每句用，有的隔句用，或吟、或咏、或歌、或诵，能够表达各种不同的思想情绪。

屈原作品丰富的思想内容，就是通过这样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

屈原的作品生动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楚国的社会现实。他的思想、观点、主张都深深植根于楚国的现实之中。高尔基曾说：“有许多实例，证明艺术家是自己阶级和时代之客观的历史家。”（《我的文学修养》）屈原的煌煌巨制，反映了战国末期楚国的社会历史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作品也可以称作他那个时代的史诗。

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一些诗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宋玉是屈原之后的重要作家，他的作品今天保存的有十二篇之多，但可确信为他作的仅《九辩》一篇而已。这篇作品完全是学习屈原的《离骚》，描写志士的坎坷不遇，在基本精神上 and 《离骚》大体一致。他想效忠楚国和楚王，然而奸佞从中挑拨，不能如愿以偿。但他绝不肯和那类人同流合污：“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食不偷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表现了他坚贞的操守。

和宋玉同时的作家有唐勒、景差，但是他们的作品早已失传了，我们无从考察。到了西汉，模仿屈原诗歌形式，以屈原生平为题材的诗歌很多，其中最优秀的是贾谊的《吊屈原》。贾谊的生平遭际和屈原相似，所以在《吊屈原》中他在吊念屈原的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的牢骚不平。感情真挚，艺术精练，是一篇杰出的作品。其他象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等，则纯粹是模拟之作，内容空洞，形式僵化，毫无真情实感，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个注本是以屈原的作品为主的，选录了屈原的作品二十三篇，作者不可考的作品两篇，宋玉的作品一篇，贾谊的作品一篇。作者不可考的作品《卜居》、《渔父》，是研究屈原思想生活的可贵资料；宋玉的《九辩》是屈原创作直接影响下的产物；贾谊的《吊屈原》是正面对屈原的悼念。

收入本书的大多为思想内容好，艺术形式也有特色，内容和形式统一的作品。凡是符合这一原则的“骚”体诗歌都在编选之列，反之象《远游》，在内容上宣扬神仙家思想，形式上抄袭司马相如的《大人赋》，而且又不是屈原作的，就不选了。《大招》在内容和形式上模拟《招魂》，缺少自己的特色，所以也不选入。

这个注本主要是根据明人复印的宋刊本《楚辞补注》和宋端平本《楚辞集注》编注的，同时参考了历代其他重要注本。对各本文字的不同，择善而从；有足资参考的异文，摘要注明。在注释上注重解决文字训诂和阐明词句的含义，以便读者在读懂文字的基础上能领会作品的思想内容。

本书的编注工作始于十多年以前，自己的主观愿望是想

尽力把这个注本搞得好一些，质量高一些，但由于自己的学历很浅，主观和客观还有一段距离，错误在所不免，热切期待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这部稿子在初写时，已故刘盼遂先生给我的帮助很大。之后，王汝弼先生也给我不少帮助。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审稿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帮助我修改。对此，一并表示感谢！

聂石樵

一九七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东方破晓，大地春回，
全国科学大会胜利闭幕之凌晨，写于北京师大。

目 录

前言	i
离骚	1
九歌	30
东皇太一	30
东君	32
云中君	35
湘君	36
湘夫人	40
大司命	42
少司命	45
河伯	46
山鬼	48
国殇	50
礼魂	51
天问	53
九章	92
惜诵	92
涉江	99
哀郢	103
抽思	108